

韬奋精神的文化传承与时代弘扬(笔谈)

编者按:2025年11月5日,纪念邹韬奋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提出,邹韬奋同志是我国现代史上卓越的文化战士、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体现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崇高风范,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形象。作为“吾党的光荣”,邹韬奋同志尽瘁国事、以笔报国的爱国赤诚,追求进步、心向光明的笃信之志,大公无我、服务大众的人民情怀,弘文传道、开拓进取的创造之才,都是新时代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要深入挖掘韬奋精神这座座富矿,在学习、研究、传承和弘扬韬奋精神的过程中,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为了纪念邹韬奋诞辰130周年,我们在上一期笔谈的基础上,邀请了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主任、原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韬奋精神青年宣讲团指导教师、人民日报理论部原主任编辑肖伟光,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青年教师焦子英,上海体育大学青年教师李林青,北京市纪委监委宣传部丛颖,分别从韬奋精神与新时代出版人的担当、韬奋精神的四重维度、韬奋精神体育观的理解与践行,韬奋精神的家庭、家教、家风及其时代意义等角度展开研讨,以期激活这份珍贵的精神资源,指引新时代出版人坚守初心,开拓进取,创新工作模式,担当起新时代出版人的历史使命,不断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关键词:韬奋精神;出版人;时代担当;体育观;家庭家教家风

中图分类号:D64;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25)06-0019-16

守望与开拓:韬奋精神与新时代出版人的担当

聂震宁

(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主任,北京 100010)

邹韬奋是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他是我国现代史上卓越的文化战士、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重温并弘扬韬奋精神,不仅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我们开创新时代新闻出版工作新局面的根本指引与力量源泉。邹韬奋缔造并毕生践行的韬奋精神——“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①,及其内核中坚定的为大众、爱祖国、敢斗争、善经营、懂管理、真敬业的理念和与时俱进的创造精神,穿越时空,成为新时代出版人始终不移的守望与开拓,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业的改革发展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一、坚守“为大众”的初心,数字技术赋能,全方位拓展出版形式

邹韬奋一生“永远立于大众立场”^②,其笔锋所向,只为民众的喜怒哀乐,皆为大众的心声;他“推母爱

收稿日期:2025-10-06

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建设研究”(24&WZD11)、韬奋基金会 2025 年度规划课题“文化主体性视域下韬奋精神的历史定位、典范意义与时代价值”(TF2025135)

① 参见沈谦芳:《邹韬奋传》,生活·新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版,第 472 页。

② 参见聂震宁:《韬奋精神六讲》,生活·新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版,第 15 页。

③ 参见陈挥:《韬奋评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 页。

以爱我民族与人群”^③，成为以笔代枪的出版旗手，在烽火连天、生死存亡的文化抗战的战场上，著下无数爱国华章。他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报刊内容和形式，不断开创生活书店的新局面。

邹韬奋创办的生活书店在抗日战争期间，敏锐地捕捉到了人民群众抗战的需求变化，及时调整出版方向。他直接领导下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充分体现了邹韬奋对青年读者需求的深刻理解。抗战时期的青年知识分子普遍渴望学习新知识、新思想，但又缺乏系统的学习材料。“青年自学丛书”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成为“青年学习马列主义、接受进步思想的主要渠道”。《大众哲学》的成功堪称生活书店选题智慧的典范。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原为《哲学讲话》，生活书店出版时将其改名为《大众哲学》，引发了普通大众阅读的热潮，发行不到五个月就出了四版。这本书“用最通俗的笔法，日常谈话的体裁，溶化专门的理论，使大众的读者不必费很大气力就能够接受”^①，深得广大青年的喜爱，被称为“救命之书”，数以万计的读者受到这本书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

八十多年过去，新时代出版人坚守爱国为民的出版情怀，肩负文化使命和社会责任，利用数字和融媒体传播技术，创新出版形式、拓展传播服务渠道，服务大众。

做红色基因的数字传承者。《红色家书》有声书项目从 72 位革命烈士遗墨中精心挑选，让革命先烈的家书通过声音穿越时空，被评为“2021 年度中国有声读物精品工程”，在“学习强国”平台播放量超 1000 万次。被列为全国“2021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的《永不消逝的电波：红色通信英雄列传》，项目组通过 AI 技术修复、上色历史照片，让革命文物“焕发新生”，让“永不消逝的电波”数字重生；同时，项目组运用 AR 技术重现抗战通信场景，读者扫码即可体验发报过程，让历史故事“立体可触”。

做数字赋能的“文化摆渡人”。获评“全球最佳减贫案例”的“e 堂好课”通过数字技术将优质课程资源输送到乡村学校，解决师资短缺问题，惠及 12 个乡镇 25 所学校，帮助山区孩子“同在蓝天下，共享好课堂”。

做乡村振兴的科技助农先锋。“三农通”平台团队二十年如一日，累计服务农民 1 亿人次，发布农业信息 86 万条，帮助 450 万吨农产品打开销路，创造经济价值 150 亿元，用户满意度达 98%。团队中有 5 名成员长期驻扎乡村，被农民亲切称为“田埂上的数字专家”。

做“数智非遗”的传承创新者。运用超高清扫描、3D 建模和 AI 识别技术，为国家级非遗和古籍建立“永不消失的数字备份”。挽救传统榫卯工艺和古法造纸技术等濒临失传的技艺，让中华文化瑰宝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对朱仙镇木版年画《年年有余》等传统艺术进行数字化改造，年画被制作成手机屏保和动态壁纸，融入现代生活。

新时代的数字出版，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价值的坚守；不仅是流量的追逐，更是精神的传递；不仅是商业模式的创新，更是服务人民的担当，是韬奋精神的传承。新时代出版人用数字技术，构筑起连接传统与现代、国家与人民的数字桥梁，让“为大众”“爱祖国”的情怀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的光芒。

二、诠释“竭诚为读者服务”使命，读者需求导向，多主体助推全民阅读

邹韬奋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服务读者方式，开创生活书店新局面。1926 年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后，立即对刊物进行了全面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开设“读者信箱”专栏，体现出鲜明的读者导向。邹韬奋坚持亲自处理大部分信件，其余的则交由同事初拟后，由他最终审阅签名。为了更好地为读者服务，《生活》周刊又成立“书报代办部”，为读者做出全方位的服务，体现了韬奋“凡是读者需要的，只要我们能办到，就竭尽心力去做”的服务精神。邹韬奋强调作品内容“有趣味、有价值”^②，避免使用诘屈聱牙的贵族文字，坚持采用“明显畅快”的平民式文字。其中“有趣味”是指切合大众精神需求，“有价值”是

① 参见艾思奇：《大众哲学》，生活·新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 页。

② 参见陈挥：《韬奋评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85 页。

指使人看了之后在道德修养上有所“灵感”。他特别强调“要用敏锐的眼光、深切的注意和诚挚的同情,研究当前一般大众读者所需要的将是怎样的‘精神食粮’”^①。

生活书店在抗战期间明确“竭诚为读者服务”^②的宗旨,加快发展,由最初的两家分店,到1938、1939年发展成拥有55家分支店的全国最大书店。生活书店“处处都充满着为大众服务的精神”。一方面,革新门市服务,首创开架售书制度。“把工作人员从柜台后面的小天地里解放出来,放到读者群众中间去”。为了让读者有更好的阅读体验,书店还在大厅的书台四周设置了座椅,“使门市权充流通图书馆”。另一方面,革新图书售卖方式,方便外地读者。生活书店与当时的十大银行签约合作,依靠其设在国内外的500多处分(支)行,为读者提供免费汇款购书服务。这一创新举措极大地便利了外地读者,特别是那些身处偏远地区的读者。

八十多年过去,新时代出版人坚持把韬奋精神“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理念落实到出版发行的实处,与时俱进,把服务精神与新时代全民阅读的推广紧密结合起来。从专业引领到公益赋能,从渠道拓展到模式创新,新时代出版人弘扬韬奋精神,以各自的特色实践,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竭诚为读者服务。

在深化全民阅读的热潮中,中国出版协会、韬奋基金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等社团组织弘扬韬奋精神,立足行业使命,链接多方资源,以多元化实践为全民阅读架桥铺路,用一个个鲜活案例诠释着文化传播的责任与担当,让阅读之风吹遍城乡角落。

中国出版协会全民阅读工作委员会发起的“百社千校万里行”读书活动,整合全国百余家优秀出版社的核心资源,摒弃“大水漫灌”的捐赠模式,在深入调研阅读需求基础上,为乡村小学量身挑选科普绘本与经典名著,为城镇中学带来人文社科精品与成长励志读物,为特殊教育学校配备无障碍阅读书籍与有声读物。活动不仅带来了即时的图书与互动,更着眼长远发展——推动更多出版单位与新疆学校建立长效帮扶机制,通过智慧平台输送优质数字阅读资源,让偏远地区师生持续享受优质阅读服务。

韬奋基金会将公益捐赠与创新推广相结合,成为全民阅读的坚实后盾。自2013年启动全民阅读图书捐赠项目以来,已联合全国300余家出版单位,向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捐赠图书累计达9亿元码洋,让千万读者共享优质阅读资源。

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让阅读服务触达更广泛的人群。被纳入极推广全民阅读优秀案例的新华文轩“点亮阅读微心愿”乡村中小学生阅读提升计划,4年来覆盖153个区县、900多个乡镇,征集并满足4万余个乡村孩子的阅读心愿,通过“心愿征集—社会认领—阅读圆梦”的模式,搭建起爱心传递与知识传播的桥梁。

新华书店整合优质数字资源,开发AI阅读助手,根据学生年龄和兴趣推荐个性化书单,系统提供“有声伴读+情节解析+阅读测试”三位一体服务,帮助学生深度阅读理解经典。店员们发扬“背篓精神”,翻山越岭传递知识,成为山区的“马背上的文化使者”,成为孩子们的阅读引路人,成为特殊群体的贴心守护者。

这些新时代出版人的行动,诠释了“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初心使命。他们用坚守与创新,在平凡岗位上书写不凡华章,让阅读点亮万家灯火。

三、兼顾“事业性和商业性”出版原则,立足精品内容,出版业实现转型跨越

邹韬奋追求事业性和商业性的统一^③。他坚持出版的事业性是灵魂,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反对为逐利而牺牲内容质量,强调应“努力巩固团结坚持抗战及建设的文化工作”。同时,邹韬奋作为一位成功的出版家,他善经营、懂管理,严格要求出版机构内部管理和外部经营业务,尤其重视深层次的经营内容,通过

^① 参见邹韬奋:《邹韬奋自述》,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83页。

^② 参见聂震宁:《韬奋精神六讲》,生活·新书·新知三联书2016版,第10页。

^③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第九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版,第681~683页。

高效率的经营管理,带领《生活》周刊、生活书店迅速发展壮大。

八十多年过去,新时代出版人传承韬奋精神,坚持社会效益第一,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改革创新,打造精品,实现传统出版机构向现代化文化服务平台的转型,让百年文脉在新时代焕发出蓬勃生机。

出版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内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下简称三联书店)在新时代的改革创新中,始终将精品内容生产作为立身之本,以“一流、新锐”为标准,在主题出版、学术出版、文化出版和大众出版等多个领域既延续出版传统,又回应时代发展需求,开展多元探索。在主题出版领域,陈晋著《为什么是邓小平》获得“五个一工程”奖^①,成为主题出版的标志性成果。《了不起的敦煌》一书入选中宣部2024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以扎实的史料、深刻的洞察,为读者解读历史伟人的精神密码与中华文明的璀璨成就。在学术出版领域,“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②出版十余年仍持续焕发活力,2024年该丛书新增6种新书。“西方现代学术文库”“当代学术丛书”“开放的艺术史”^③等经典品牌丛书不断迭代更新,收录了许倬云《美国小史》、金冲及《漫谈治史》、巫鸿《天人之际》等一批大家之作^④,全面呈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成果,代表了当代思想与学术的国家水准。在文化出版领域,“新知文库”从2018年的100种扩容至2024年的170种并推出新版,成为普及人文社科知识的重要载体。在大众出版领域,《汉字与中华文化十讲》《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等作品屡获“中国好书”“文津图书奖”等重要奖项。

在数字化时代,三联书店以开放的姿态拥抱技术变革,通过“内容+技术”的深度融合,构建了覆盖纸书、期刊、数字平台、线下空间的全媒介传播矩阵,实现了从“出版图书”到“提供知识服务”的转型跨越。打造的融合型知识服务平台——中读APP,已积累近150万用户,付费率高达15%,成为知识付费领域的佼佼者。

三联书店旗下的“韬奋书店”,打破“出版社”与“书店”的传统界限,构建了集内容生产、展示销售、文化服务于一体的新型文化生态,已成为北京的一个城市文化地标,为实体书店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样板。

2024年,三联书店以其卓越、丰富的改革创新实践,在“缩量市场”的严峻环境下,依然实现了营收小幅增长、利润两位数增长的良好业绩,证明了改革创新的强大动力,在出版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为传统出版机构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四、坚持“人才主义”的管理理念,守望开创,新时代出版人才勇挑大梁

邹韬奋最大的希望就是吸纳人才、爱护人才、人尽其才、留住人才。邹韬奋主持《生活》周刊社和生活书店时,始终坚持“人才主义”,高度重视人才工作。作为总经理,他在思想上、生活上对员工队伍给予无微不至关怀。再忙他也要亲自参加新员工招考工作,从员工宿舍、住房到食堂营养,都在他的悉心关注之下。可是,在管理上,邹韬奋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要求员工忠诚地为读者服务,做事总是要认真,要负责,绝对不可以马虎。生活书店制订了员工办事规则,每一位员工在自己的岗位上都有章可循。譬如,强调卖书的员工不可以不知书,不可以读者一问三不知。对于干部,邹韬奋的要求则更加严格全面。他要求干部必须有“对于人事方面的大公无私,是非明辨的精神,必以事实为根据而不以私人的感情为标准:这是主持事业者主要的基本态度。”^⑤他说,凡认真爱护事业的人,都应该诚心诚意地爱护干部。他提出的干部爱护措施相当具体:(一)要注意干部的需要和困难,需用最关切的态度,尽力帮助解决;(二)要注意

^① 参见舒晋瑜:《打造竞争优势 加快深度融合》,中华读书报 2015.01.08。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第九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版,第 647 页。

教育干部,使他们的天才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三)要注意分配干部以最适当的工作;(四)要注意保护并增进干部的健康;(五)要注意提拔干部;(六)要注意奖励干部;(七)要注意使干部能有机会尽量贡献他的意见,并虚心考虑他的意见;(八)要注意使干部没有内顾之忧和后顾之忧。^①

为了让青年员工更好地学习出版发行业务,加深对文化事业的认识,生活书店创办了内部刊物《店务通讯》,提供给员工们学习交流。邹韬奋对这份内刊非常重视,对刊物的编辑、设计、印装和发行都提出很高的质量要求。从第二十一期起,他每期都会写一篇文章在这份刊物上发表,这些文章一直都是员工们争着要读的佳作。这份内刊一共出版 108 期,是生活书店史也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一份珍贵的文献。邹韬奋把自己在《店务通讯》上发表的文章编辑成书,书名为《事业管理与职业修养》,是我国现代出版业最早关于出版发行职业培训的教科书。

邹韬奋要求员工特别注意学习和提高。他在《店务通讯》上写道:“本店同人向来有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学习的兴趣相当的浓厚。”^②“我们‘工作第一’,不但不反对学习,而且要提倡学习。”^③“学习是进步的源泉,进步可以增加工作的效率;这两方面应是相辅而不应该相妨碍的。”^④邹韬奋让青年员工组成读书会,组织专题阅读,交流心得。全店每月至少举办一次周末晚会,除报告一些店内情况,一定会安排一个极好的国内外形势报告或抗战动态报告,报告人有时是店内的领导,有时是外请的名人,这些高水平的报告使得员工眼界开阔、精神振奋、境界提升。生活书店在邹韬奋的带领下,一直保持着一股学习的热气。

八十多年过去,新时代出版人传承韬奋精神,高度重视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精湛、勇于创新、结构优化的新时代出版人才队伍正在不断发展壮大。

高素质专业出版人才队伍是新时代出版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一是聚焦出版业的编辑、校对、发行、数字出版等核心业务,加强出版学科建设,设立出版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学位教育,为出版业培养出一批批新锐专业力量。二是通过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组织编辑业务技能大赛、在职编辑接受继续教育以及出版机构内部“师带徒”等多种方式,推动编辑出版队伍专业素养不断提高。

数字出版人才为出版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新动能。各地出版单位加大对数字出版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力度,通过与高校合作开设数字出版专业、举办数字出版技能培训班等方式,培养了一大批既懂出版业务又掌握数字技术的复合型人才。这些人才利用新技术对传统出版物进行数字化改造,推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电子书、有声书、互动读物等数字产品。数字出版人才队伍已成为推动出版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力量。

青年人才已逐渐成为新时代出版业的中坚力量。据统计,在全国出版单位中,35 岁以下青年编辑占比超过 40%。他们既传承出版行业的优良传统,又具备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他们成长于数字时代,具备互联网思维和技术敏感性;他们熟悉社交媒体运营,了解用户需求,擅长数据分析和可视化表达,能够快速掌握新技术工具。经他们之手,一批具有时代特色、富有青春气息的出版物深受读者喜爱,出版业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新时代出版人始终不移的守望与开拓韬奋精神,担当起历史使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业的改革发展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①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第九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版,第 649 页。

② 同上,第 697 页。

③ 同上,第 700 页。

④ 同上,第 701 页。

论韬奋精神的四重维度

肖伟光¹,焦子英²

(1.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上海 200240;2.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助教,上海 201808)

邹韬奋是“我国现代史上卓越的文化战士、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出版家和新闻记者”^①。1944年,中共中央在唁电中指出,“韬奋先生二十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决不屈于强暴,决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犹殷殷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长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②这不仅是对邹韬奋一生事业的历史定评,也彰显了韬奋精神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他所彰显的“尽瘁国事、以笔报国的爱国赤诚,追求进步、心向光明的笃信之志,大公无我、服务大众的人民情怀,弘文传道、开拓进取的创造之才”,^③共同构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相互支撑的精神体系。在新时代背景下,从学理上系统地重释这一体系的四重维度,不仅意在追念先贤,更旨在激活这份珍贵的文化传统与精神资源,使其成为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内在动力。

一、尽瘁国事、以笔报国的爱国赤诚

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邹韬奋以文化出版为阵地,自觉担当起思想引领与舆论动员的时代使命,对于我们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建设与巩固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抗战的时期,笔杆应该和枪杆联系起来,文化食粮的供应应该和军火的供应配合起来”^④,一切为了抗战、一切为了民族解放、一切为了人民利益,这就是积极推广大众文化的现实指向,这就是邹韬奋的文化自觉。^⑤他深刻认识到,必须通过有效的文化组织工作,将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无限创造力量凝聚成有组织、有方向的革命力量,从而在思想舆论领域确立进步话语的主导地位,更好推动抗战救国。

首先,他实现了从启迪民智到组织民力的认识飞跃。在力谋社会改造的探索中,邹韬敏锐地洞察到:“深信中国要得救,要走上轨道,绝不是任何个人所能负起这个使命的,必须有一个组织严密,计划周详,真心为民族前途大众福利而努力奋斗集团,领导全国民众共同奋斗,才能负得起这个重大的使命。”^⑥这一认识使他超越了单纯的文化启蒙者角色,成为进步文化力量的积极组织者。与我们党领导的游击队相呼应,邹韬奋称自己从事的工作是“文化游击队”^⑦。邹韬奋还把生活书店员工比喻为“为文化事业冲锋陷阵的一个小小军队”^⑧,把自己办的报刊比喻为“喇叭手”“高喊当前民族应走的道路,怎样走法”^⑨。他不再满足于零散的思想传播,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以《生活》周刊和生活书店为核心的文化组织体系。

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建设研究”(24&WZD11)、韬奋基金会 2025 年度规划课题“文化主体性视域下韬奋精神的历史定位、典范意义与时代价值”(TF2025135)

① 参见纪念邹韬奋同志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举行,人民日报,2025-11-06。

② 参见沈谦芳:《邹韬奋传》,生活·新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版,第 463 页。

③ 参见纪念邹韬奋同志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举行,人民日报,2025-11-06。

④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第九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版,第 186 页。

⑤ 参见韩庆祥、肖伟光等:《韬奋精神的丰富内涵与当代价值(笔谈)》,《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5 期,第 17-34 页。

⑥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版,第 16 页。

⑦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第十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版,第 797 页。

⑧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第五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版,第 629 页。

⑨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第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版,第 356 页。

这一体系通过遍布全国的生活书店,将进步书刊和抗日主张系统地输送到社会各界,把自发的民众关切转化为自觉的民族救亡意识,实现了对分散社会力量的文化整合。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之所以被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赞誉为“今日抗战中之指针”,那是因为它“讲人民大众想讲的,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①,大量报道并深刻分析与抗战有关的国内国际形势,敢于为人民主持正义,敢于为真理而斗争,真正做到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②

其次,他开辟了文化动员与政治认同相互促进的实践路径,为爱国注入了灵魂和方向。面对九一八事变后国土沦丧、舆论纷乱的局面,邹韬奋深知思想舆论阵地的重要性,毅然将《生活》周刊转变为抗日救亡的舆论先锋。在“小言论”等栏目中,他持续抨击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旗帜鲜明地呼吁“必须抵死反抗”。这些言论并非被动回应时局,而是主动设置公共议题,塑造进步舆论,有效制衡了当时存在的妥协退让思潮。他通过“读者信箱”“小言论”等栏目,将民众的个人苦闷与民族命运有机联结,引导读者从个体境遇的思考上升到对社会制度的反思。在国民党当局对 55 家生活书店分店进行无理查封的艰难时刻,他表示“我们深信进步的文化事业有其伟大的贡献,有其无限光明的前途,我们必须而且必能排除万难,向前递进!”^③这种信念不仅是对文化阵地的捍卫,更是对进步政治立场的彰显。他的办刊实践和书店经营,实际上构建了一个以进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统一战线,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做好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再者,他确立了政党引领与民众觉醒辩证统一的价值取向。邹韬奋始终坚信救国运动必须要由思想领导才能发生力量。他通过出版《萍踪寄语》等著作,系统介绍各国社会制度;通过主编《大众生活》等刊物,深入浅出地宣传团结抗战的主张。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言:“我们党的抗日救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要是通过韬奋主编的刊物传播到国民党统治区广大知识分子中去的。韬奋在国统区知识分子中的威望最高,我们党专门在国统区做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人都比不上他。”^④他的文化斗争,不是简单的观点表达,而是着眼于从根本上塑造民众的国家认同与政治意识,为民族解放事业筑牢思想根基。邹韬奋对文化领导权的实践,最终指向了对先进政党的政治认同。他深刻认识到,一盘散沙的民众运动难以形成持久强大的力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文化动员才能转化为有效的政治实践。这种认识使他从真诚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其文化实践也由此获得了更为明确的政治归属和更为强大的组织支撑。1938 年,邹韬奋向周恩来同志提出入党申请,但出于革命事业的需要,周恩来认为邹韬奋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在国统区开展工作更有意义。他赞成周恩来良苦用心的考虑,并在思想和行动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一致。邹韬奋生前虽然在组织上没有入党,但是思想上已然成为一名杰出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邹韬奋去世后,中国共产党在致亲属的唁电中追认其为党员,并称其为“吾党的光荣”,他生前最重要的愿望得以实现。^⑤

二、追求进步、心向光明的笃信之志

周恩来同志为纪念邹韬奋曾亲笔题词:“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⑥。陈毅也说过:韬奋先生“是以一个民主主义者走入战场,伟大的革命实践推动他向前迈步,直至与共产主义相结合,最后以他的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服务的品质和事业,置诸共产主义者前列,可说毫无愧色。因此邹先生的道路是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最终结合的道路。”^⑦邹韬奋从一位真诚

①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一八九八—一九四九)》,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版,第 420 页。

② 参见肖伟光,张羽慧:《韬奋精神的时代回响》,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25 版,第 76 页。

③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第九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版,第 588 页。

④ 参见肖伟光,张羽慧:《韬奋精神的时代回响》,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25 版,第 139 页。

⑤ 参见肖伟光,张羽慧:《韬奋精神的时代回响》,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25 版,第 178 页。

⑥ 参见陈挥:《韬奋评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83 页。

⑦ 参见陈挥:《韬奋评传》,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68 页。

的民主主义者最终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一“心向光明”的历程,常被解读为时代浪潮推动下的必然归宿。然而,若深入其思想世界,我们会发现,这更是一个主体性极强的、充满内在张力的理性选择过程。

这一理性抉择的过程,清晰地呈现为破旧与立新两个相互交织的阶段。

破旧,源于其对国民党政权的系统性失望与理性批判。他寄予厚望且理应负起洗雪国耻责任的国民党当局不仅没有负起应有的责任,反而把国内政局搞得乌烟瘴气,战火连绵,民不聊生。从日益严苛的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到无理查封生活书店的残酷打击,他切身认识到,一个不抵御外侮、缺乏民主、压制言论、无法凝聚民心的政权,在组织能力上已彻底破产,根本无法承担领导全民抗战的历史重任。他痛心疾首地说道:“我们不但不应该这样分散自己国家的力量,而且要使整个国家的抗敌力量更强化起来。”^①这种基于现实的判断,是其与旧政权决裂的理性基石。

立新,则建立在其对世界发展道路的严谨比较与制度分析之上。为探寻救亡图存之道,他两度流亡海外,进行了为期近两年的环球考察。在《萍踪寄语》与《萍踪忆语》中,他如同一位冷静的社会观察家,既精准剖析了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少数人的穷奢极欲,生活异常阔绰”“多数人的日趋贫乏,在饥饿线上滚”^②的深刻结构性危机,也详细记录了苏联“积极努力于新社会建设”“情形日新月异”^③的蓬勃景象。通过这场跨越制度壁垒的实地调研与深入思考,他完成了思想的剧烈飞跃。他得出结论: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出路。这一结论并非源于情感的冲动或主义的空想,而是基于亲眼所见、亲身所感的结论,为他日后的人生抉择,铺下了坚实的理性基石。他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实现其救国理想的托付,其临终前申请入党的感人举动,则是这一理性判断最终升华为坚定信仰与组织归属的必然结果。

与一个个具体的共产党人的交往与共鸣,更升华为坚定的政治皈依与情感认同。理论的种子,需要现实的土壤才能生根发芽。真正让邹韬奋完成从思想到行动彻底转变的,是他与一群共产党人的相遇与相知。胡愈之最早将他引向马克思主义,为他的事业打开了新的视野;化名“莫文华”的刘少奇,通过书信与他探讨时局,帮他廓清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迷雾;而与周恩来的交往,则让他深切感受到一种战略家的远见与同志式的信任。当邹韬奋提出入党请求时,周恩来从大局出发,恳切希望他以民主人士身份继续战斗,他欣然接受,并在日后回忆道:“从武汉到重庆,直到我离开重庆到香港,其后,回到上海,转到解放区,我的一切工作和行动,都是在党和周恩来同志指示下进行的。”^④乃至生命垂危之际,陈毅等共产党人下令全力救治,辗转送医,给予他最后的温暖与庇护。1944年,病榻上的邹韬奋留下最后的请求:“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⑤这不是一份简单的申请,而是他毕生探索的最终归宿。他用自己的生命,代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一条光明的道路。

三、大公无我、服务大众的人民情怀

邹韬奋逝世后,毛泽东同志为他亲笔题写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⑥邹韬奋坚持“永远立于大众立场”、坚持“竭诚为读者服务”,以其卓越的智慧与赤诚的奉献,将“真诚地为人民服务”具象化为一场关于大众文化的深刻思考与伟大实践,成功探索出一条既能推广大众文化、又能促进民族解放的文化建设之路。

在何为大众文化的层面,邹韬奋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充分发掘人民群众的

①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第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版,第625页。

② 同上,第11页。

③ 同上,第9页。

④ 参见沈谦芳:《邹韬奋传》,生活·新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版,第322页。

⑤ 同上,第459页。

⑥ 同上,第472页。

力量，“笔柄千秋唤救亡”，他是抗战期间文化领域的领军人物。^① 邹韬奋对文化的理解摒弃了故弄玄虚，他从所从事的职业出发，一针见血、直指问题本质：文化主要体现于“言论出版及教育各部门”^②。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他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文化工作的立场问题：“文化工作是为着少数人干的呢，还是要为着大多数人才干的？我们先要认清这个基本问题。”^③他深刻认识到“大众的伟大的力量是新时代的最最重要的象征”^④，在民族危亡之际，实现民族解放所能依靠的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力量，而不能指望少数自以为是的所谓精英或者虚无缥缈的外部势力，这是邹韬奋在实践中得出来的结论。^⑤ 因此，文化必须有一个新的动向，即全力走向大众，“培养大众的伟大力量”^⑥。他所倡导的大众文化，是以促进民族解放与推广大众文化为双重使命，是服务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具有鲜明人民性的文化。

在如何办大众文化的层面，邹韬奋以《生活日报》为理想蓝图，进行了一系列系统而前瞻的范式创新。这份未能完全实现的报纸，凝聚了他关于如何办好大众文化的全部智慧。在性质上，坚持绝对公开，要做到真正的民治、民有、民享。邹韬奋理想中的《生活日报》，可让“有钱的踊跃投资，没有钱的出一块钱，一角钱，一个铜子，或者不出钱都可以”^⑦，其内部组织、发行数量乃至会计收支都向公众绝对公开。他呼吁同胞们将报纸当作大家的公物看待，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扶持它，这使报纸从少数人的私产转变为大众共有的公共文化平台。在内容与立场上，他坚定主张，“言论要完全作人民的喉舌，新闻要完全作人民的耳目”^⑧。内容必须适应大众的需要，反映各界人士的要求，而非专供少数人鉴赏。同时，他严格划定了文化的公共责任，强调“对于所刊广告要严格限制，骗人害人的广告一概拒登。”^⑨ 在文风与传播上，推行文字大众化与渠道深入化。为使文化真正抵达大众，他力行“文字力求大众化”^⑩，要求“尽可能用口语文来写论文和新闻”^⑪，务求让识字不多的妇孺、工友、农夫都能看懂。在发行上，他立志让报纸深入到“不论穷乡僻壤，天涯海角”^⑫，并通过“识字的同胞们，尽经济可能购阅本报，并且把本报的内容，讲解给不识字的同胞们听”^⑬的方式，构建了一个由大众参与并服务于大众的立体化传播网络。在价值内核上，坚守引导向上的启蒙使命。邹韬奋的大众文化实践，核心在于“促进民族解放，推广大众文化”^⑭。他通过“读者信箱”等栏目，将个人苦闷与民族命运相联结，引导读者从“小我”的悲欢中走出，思考“大我”的前途。他的文化工作，始终致力于在服务大众的同时提升大众，实现融入与引导的辩证统一。

四、弘文传道、开拓进取的创造之才

邹韬奋的创造之才，不仅体现于笔尖的锋芒，更贯穿于他作为一位文化事业战略家与实干家的全部实践。他以非凡的远见与魄力，为中国进步文化事业的现代化运营，树立了组织创新、媒介融合与危机管理的三重典范。

他以合作社为基石，完成了进步文化事业的组织创新。邹韬奋的开拓始于制度层面。为使文化事业

^① 参见韩庆祥、肖伟光等：《韬奋精神的丰富内涵与当代价值(笔谈)》，《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第17-34页。

^② 参见沈谦芳：《邹韬奋传》，生活·新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版，第254页。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参见韩庆祥、肖伟光等：《韬奋精神的丰富内涵与当代价值(笔谈)》，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7(05):17-34。

^⑥ 参见沈谦芳：《邹韬奋传》，生活·新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版，第254页。

^⑦ 参见沈谦芳：《邹韬奋传》，生活·新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版，第259页。

^⑧ 参见沈谦芳：《邹韬奋传》，生活·新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版，第258页。

^⑨ 同上。

^⑩ 同上。

^⑪ 同上。

^⑫ 同上。

^⑬ 参见沈谦芳：《邹韬奋传》，生活·新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版，第259页。

^⑭ 参见沈谦芳：《邹韬奋传》，生活·新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版，第254页。

不被资本裹挟,能纯粹地服务大众,他在生活书店创造性推行了“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①的生产合作社制度。这一“绝无仅有的创举”^②,使每一位员工都成为事业的主人。它不仅是经济民主的试验,更是一种深刻的组织哲学:通过限制个人持股份额,从根源上保障了事业不为私利所困,能够始终如一地坚守服务大众的初心。同时,他推行人才主义的用人政策,激发了全体员工的主人翁精神,使生活书店从“两个半人”起步,最终发展成为拥有四五百人的极具凝聚力的团队。

他以生活系为矩阵,构建了深度融合且内容为王的媒介生态。邹韬奋的才华在于,他从不满足于单一媒介的成功,而是致力于构建一个协同作战的文化传播生态系统。在办报实践中,他始终关注革命形势的动态、劳苦大众的悲欢、知识青年的迷茫和民族工商业者的挣扎^③。他将读者服务做到极致,以《生活》《大众生活》《全民抗战》等一系列刊物作为内容先锋,以生活书店遍布全国的分店作为发行骨干与市场终端,形成了刊店联动、内容与渠道无缝衔接的强大格局。这并非简单的业务拓展,而是一种前瞻性的“媒介融合”实践。他深谙规模化、品牌化与协同效应的力量,通过这个自成一体的传播矩阵,系统化地将进步思想输送到社会的神经末梢,使得《生活》周刊发行量达15.5万份,《大众生活》达20万份,《全民抗战》达30万份,生活书店遍布全国14省55城、成为当时最受青年人喜爱的出版机构之一^④,打造了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综合性文化传播集团”,社会影响力巨大。

他以韧劲为盾牌,展现了卓越的文化危机管理智慧。真正的开拓者,不仅善于建设,更善于在逆境中生存与反击。面对国民党当局的残酷打压,生活书店各分店被无理查封。至暗时刻,邹韬奋展现了非凡的危机管理能力。他一方面坚守原则,发表宣言痛斥暴行,进行悲壮的合法抗争;另一方面则灵活应变,如建立香港备份基地,采取化整为零、秘密发行、联合其他书店共同发行等多种策略,在夹缝中为进步文化事业开辟生存空间。这套在危机中锻造出的非凡生存能力,保住了国统区进步文化事业的命脉。这套组合拳式的危机管理,由宏大的历史数据和党的权威论断给予了最有力的证明。首先,在数量上。建国前国内出版的四百多种“红色读物”中,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就贡献了二百多种,占据了半壁江山。^⑤更重要的是在性质上,中共中央在1949年《关于三联书店今后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明确肯定“三联书店与新华书店一样,是党领导下的书店”,并赞誉其“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及香港起过巨大的革命出版事业主要负责者的作用”,“这个书店的工作人员,如邹韬奋同志等,做了宝贵的工作”。^⑥1983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再次发文明确指出,这些书店“实际上起到了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出版发行机关的作用”^⑦。这些铿锵有力的历史结论雄辩地昭示:邹韬奋及其同仁所开创的事业,在危机中的艰苦奋斗,成功地将一个文化出版机构,锻造成了党在白色恐怖下传播真理、争取人心的坚强文化堡垒,其危机管理的高度与价值,正在于此。

回望邹韬奋的精神历程,其精神世界的四个维度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以爱国赤诚为根基,以追求进步为方向,以服务大众为归宿,以弘文传道为路径。这种精神特质不仅属于历史,更具有跨越时空的生命力。正如邹韬奋在《经历》中的自述:“我在二十年前想要做个新闻记者,在今日要做的还是个新闻记者——不过意识要比二十年前明确些,要在‘新闻记者’这个名词上面,加上‘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一个形容词”^⑧,这种始终如一的坚守,正是其精神力量的最好注脚。这四个方面共同作用,使他成功地将一个知识分子朴素的爱国情感,升华为自觉坚持和巩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伟大实践,将他个人的事业追求,

① 参见聂震宁:《心向光明:邹韬奋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第245页。

② 参见聂震宁:《韬奋精神六讲》,生活·新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117页。

③ 参见陈云龙,肖伟光:《从韬奋精神中汲取文化力量》,中国纪检监察报,2025-10-30。

④ 参见韩庆祥,肖伟光等:《韬奋精神的丰富内涵与当代价值(笔谈)》,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7(05):17-34。

⑤ 参见韩庆祥,肖伟光等:《韬奋精神的丰富内涵与当代价值(笔谈)》,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7(05):17-34。

⑥ 参见方厚枢:《中国当代出版史料文丛》,中国书籍出版社2007版,第27页。

⑦ 参见《新时期组织工作手册》编写组:《新时期组织工作手册》,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487页。

⑧ 参见邹韬奋:《韬奋全集(第七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版,第259页。

融入了民族解放与人民革命的洪流。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韬奋精神依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他所倡导的“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出版理念,为今天的媒体融合指明了方向;他所践行的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为文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韬奋精神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富矿,他的精神遗产,如同不灭的灯火,将继续照亮一代又一代文化工作者与知识分子的前行之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从“健己”到“报国”:对邹韬奋体育观的理解与践行

李林青

(上海体育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8)

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语境中,体育被赋予了强健国民体魄、重塑民族精神的特殊使命。邹韬奋作为中国进步新闻出版事业的旗帜性人物,其体育观的形成与实践不仅反映了个体的思想演进,更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关头对体育功能的深刻思考。笔者以韬奋先生“健己建国”的体育观为切入点,探讨其思想内涵与当代价值,并思考如何从自身出发践行与弘扬韬奋精神。

一、韬奋体育观的生成进路

邹韬奋体育观的形成源于特定历史环境的催化、个人经历的积淀以及多元思想资源的交融,是时代需求与个人探索共同作用的产物。为了更好理解他的体育观,我们需要走进他的成长轨迹,看他如何从切身感受出发,最终将体育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

韬奋先生 1895 年出生于福建永安,这一年正值甲午战争清廷惨败、《马关条约》签订。福建作为海军重镇,中西文化交融、救亡思潮涌动,或潜移默化塑造了邹韬奋的人生与健体理念。上海九年的求学经历为他认识体育价值打下了坚实基础。在上海南洋公学求学时,他深受“勤学不倦之士,与精于运动之士,必不以嗜欲自戕其身”^①校风的熏陶,形成了真正的读书人不仅要学问好,更要身体强健,不能因放纵欲望而损害健康的认识。后来他转入圣约翰大学,这所大学将体育视为“养成完全人格”的必要途径。圣约翰大学史等史料记载,学校每年定期举办春秋两季全校运动会,要求所有学生按班级参加,其规模之大、项目之全、竞争之激烈,堪称华东之最。^②在这里,体育不仅仅是锻炼身体,更是培养健全人格的重要方式。求学经历让年轻的邹韬奋体会到体育运动对一个人精神面貌、意志品质的积极影响。

走上工作岗位后,邹韬奋对体育的认识更加务实。在编译《职业心理学》过程中,他特别关注到“体力与耐力,对于服务及择业皆有甚大之关系”这个观点,认为身体健康不是个人的私事,它直接关系到每个人能胜任什么工作、能在岗位上坚持多久、能为社会做出多大贡献。他自己也深有体会——新闻出版工作强度大、节奏快,没有好的身体根本难以胜任。因此,他在生活书店内部也倡导工间操、提倡劳逸结合,认为这是提高工作效率、保障员工福祉的重要举措,并提出“健必美,不健必不美,健和美是相连的”^③。1936 年,因“七君子事件”身陷囹圄的邹韬奋仍将体育锻炼列为每日例课,他总会“沿着天井的四周跑步”

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建设研究”(24&.WZD11)、韬奋基金会 2025 年度规划课题“文化主体性视域下韬奋精神的历史定位、典范意义与时代价值”(TF2025135)

① 参见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韬奋全集·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版,第 76 页。

② 参见熊月之,周武:《圣约翰大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版。

③ 参见《韬奋全集》(增补本)编委会:《韬奋全集(增补本)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73-178 页。

足足“二十圈”，完毕后继续完成他的“柔软体操”。^①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邹韬奋敏锐地意识到，国民体质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在其主编的刊物上，他开始有意识地将体育训练与抗战需要联系起来，强调通过体育锻炼培养国民的纪律性、耐力和战斗精神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体育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强身健体，而是“强国强种”，是直接服务于抗日救亡时代使命的重要途径。

从个人健康到职业需要，再到民族救亡，邹韬奋对体育的认识历程，是他人生经历中一步步体悟、在时代洪流中不断深化的结果，更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将个人体悟与时代使命不断融合的生动写照。他没有把体育当成空洞的口号，而是在每个阶段都找到了体育与现实的深刻联系，这种务实而深刻的体育观，至今仍值得深思和借鉴。

二、韬奋体育观的内涵与价值

在民族危亡的特殊历史语境下，邹韬奋以“健己”与“建国”的辩证统一构建起独特的体育观，这一思想体系既植根于时代需求，又超越了单纯的体质论范畴，形成了兼具学理深度与实践价值的逻辑框架。其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可从三个维度展开剖析。

一是，从个体到民族的逻辑递进。邹韬奋体育观的核心命题，在于“健己”与“建国”的辩证统一。邹韬奋在求学时期就痛心于许多品学兼优的年轻学生因身体不好而夭折的现状，提出应从小养成“一种喜欢运动和卫生的好风气”，并希望这种风气“变成国民的第二天性”^②。所谓“健己”，在他看来，是通过科学、持续的体育锻炼来增强个人体质，预防疾病，从而提升工作效率与生活质量。这种对个体健康的关注，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其“建国”理念具有更宏大的视野，将国民体质的普遍增强与国家摆脱“东亚病夫”、民族复兴紧密联系起来。在“外患逼迫”的背景下，他深刻意识到体育绝非个人健康问题，而是关乎国家存亡的议题。

这种“健己建国”的体育观还体现在对“军国民教育”的批判性反思中。邹韬奋特别强调：“非欲效法帝国主义者所施军国民教育之但作侵略他国的准备，乃在健全民族的体格而求自卫。”^③他敏锐区分了帝国主义军事扩张逻辑与中国体育自卫的本质差异，指出前者“只为侵略他国做准备”，而中国体育的目标在于“强健民族体魄以实现自卫”。这种区分不仅展现出韬奋先生对特定有害思潮潜在危害的早期警觉，更在实践维度上对当时盛行的旧式军操予以反对，主张采用“相较于军操，其优越性远超数十倍乃至百倍”的软式体操进行替代，充分彰显出其体育思想中所蕴含的人文关怀精神。

二是，从精英到全民的实践路径。在“健己建国”目标的指引下，邹韬奋对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的态度体现了高度的辩证思维。他充分肯定竞技体育的价值：“这些成绩‘无异为运动界立一标准’，能够激励更多人参与锻炼。”但同时尖锐批判将竞技体育精英化、孤立化的倾向，明确反对“只注重少数运动员剧烈运动而忽视全体国民体育普及”的做法。其体育普及的目标具有明确的社会指向性：“锻炼身心的健康”“训练尊重纪律的习惯”“养成公正理解的态度”以及“增加团结互助的精神”，这些目的需“普及于一般国民”。

这种竞技体育与大众体育的辩证统一理念在其新闻实践中得到生动体现。邹韬奋报道体育新闻时，“并非仅仅追逐赛事的胜负与明星效应”，而是着重挖掘赛事背后的体育精神及其对普通民众的激励作用。例如，他特别称赞运动中的“合队工作”精神，认为这种团结协作的品质“对于社会和国家也至关重要”。这种以大众为本位的体育推广理念，使其体育观超越了强身健体的物理层面，升华为“通过体育塑造新民、服务社会”的深刻思考，形成了从竞技激励到全民参与的实践链条。

^① 参见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韬奋全集：第7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239页。

^② 参见《韬奋全集》（增补本）编委会：《韬奋全集（增补本）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416-418页。

^③ 参见中国韬奋基金会韬奋著作编辑部：《韬奋全集：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版，第383页。

三是,从体质到社会的价值拓展。邹韬奋对体育功能的理解呈现出显著的开放性特征,其内涵远超单纯的体质锻炼,而是涵盖了健体、美育、社会教育、女性解放及娱乐等多重维度。他提出体育是“社会综合教育”的有效形式,能够培养人的团队合作精神、规则意识与坚韧毅力。这种多维功能的系统阐释在其女性体育倡导中尤为突出。针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的现实,邹韬奋较早肯定女子体育的意义,“不仅关乎女性健康,更影响后代体质与民族未来。”他通过《生活》周刊等媒体积极宣传,鼓励女性突破传统束缚,“通过体育获得健康体魄与自信精神,为其参与社会活动奠定基础”。这一观点与其女性解放思想形成呼应,体现了体育作为社会变革动力的潜在价值。

在传播策略上,邹韬奋通过《生活》周刊等媒体,以“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普及体育理念,在“读者信箱”栏目中耐心解答健康疑问,既传播科学知识,又增强媒体的服务性与亲和力。更值得关注的是,他将体育传播与抗日救亡紧密结合,在《抗战》三日刊中突出宣传体育对军事训练与民众防卫的价值,引导读者“将体育锻炼直接服务于救国实践”。这种“价值共创”的媒介策略,不仅推动了体育观念的大众化,更为体育注入了鲜明的时代使命感。

邹韬奋的体育观以其独特的时代洞察力与理性思辨,构建起从个体健康到民族复兴、从竞技激励到全民参与、从体质改善到社会变革的多维理论体系。其思想不仅在历史语境中具有进步意义,更为当代体育发展提供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参照,彰显了体育作为社会进步推动力的永恒价值。

三、韬奋体育观的当代启示

韬奋体育观对今天的我们仍具有强烈的启示意义。笔者认为,践行韬奋精神可从以下方面着手:一是个人层面,树立“健己”与“报国”统一的体育观。体育锻炼不应仅停留在“为了健康”的个体层面,而应融入社会责任与时代使命的意识。例如,通过参与社区体育志愿服务、推广科学健身知识等方式,将个人健康实践转化为社会价值创造的契机。二是教育层面,推动体育与德育、智育的深度融合。学校体育可借鉴韬奋“身心一统”的理念,突破技能训练的局限,注重通过体育活动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意志品质与审美素养。同时,加强家校社协同,构建开放式的体育教育网络。三是社会层面,倡导体育资源公平共享与大众化发展。体育场馆、活动资源应进一步向公众开放,避免过度精英化、商业化倾向。媒体也应承担起体育科普与价值观引导的责任,关注普通人的体育参与而非仅聚焦竞技赛事。四是文化层面,挖掘体育的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实践,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和精神追求。可通过体育主题的文艺创作、历史研究、公众讲座等形式,深化社会对体育文化价值的认知,推动体育成为塑造国民精神的重要载体。

邹韬奋的体育观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关头对体育功能深刻思考与积极实践的具象化。其“健己建国”的目标导向、“身心一统”的价值观念、“价值共创”的传播策略,至今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今天我们重温韬奋体育观,不仅要理解其历史内涵,更要以实际行动弘扬其精神,使体育真正成为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唯有如此,方能实现韬奋所期待的“健己”与“报国”的有机统一,使体育在新时代更好发挥其独特而深远的价值。

邹韬奋的家庭、家教、家风及其时代意义

丛 颖

(北京市纪委监委宣传部干部、政工师,北京 101160)

谈及邹韬奋,学界目光多聚焦于其新闻出版事业的辉煌成就与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若将视角转向其家庭生活这一微观场域,则不难发现,韬奋先生在家庭、家教、家风方面体现出的智慧,恰是映照其精神世界的一面明镜,呈现出三个主要特点。

一、把家国情怀刻进家庭底色

韬奋先生一生秉持“服务社会、启迪民智”的信念,这一信念不仅贯穿于其主编《生活》周刊、创办生活书店的公共事业中,也深刻融入他对子女的教育实践中,形成爱家爱国相统一的教育路径。他并未将家庭教育局限于知识传授或技能培养,而是将其视为培育社会责任的起点。

在具体实践中,韬奋先生善于将民族大义与社会责任转化为子女可感可知的生活体验。他常与子女共读进步书刊,讲解民族命运与时代责任;有意识地带领他们体察民间疾苦,使他们亲身感受社会的脉搏与民众的期待。这种“社会即课堂”的开放式教育,使家国情怀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成为可触摸、可共情的情感认同,实现了“知行合一”的深层教化。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①在邹韬奋看来,家庭不是隔绝于世的“避风港”,而是涵养公民意识与家国责任的第一现场。他通过日常交谈、时事评析与生活实践,将“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的道理具象化,使爱国自然内化为其子女的价值取向与行为习惯。韬奋先生长子邹家华在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作出了卓越贡献,是我国经济建设战线、国防工业战线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杰出领导人。次子邹竞蒙担任过中国气象局局长、名誉局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连任两届世界气象组织主席,为中国和世界气象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小女儿邹嘉骊一直追随父亲的事业,从事文字工作,在韬奋著述的文献整理和韬奋研究的资料收集方面作出了贡献。

二、把品德塑造熔铸为家教基石

邹韬奋对物质生活的淡泊,并非偶然,而是深植于邹氏一脉相承的家风。韬奋先生的祖父邹舒宇为官多年,从来不因权重位高而仗势凌人,他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勉励他们要“清白做人,清廉做事,勤奋苦学,自持自力,用自己的双手来养活自己和家人,做一个对家庭和社会有用的人。”^②韬奋先生不仅继承了祖辈们一代代传承下来的良好家风和清廉家教,也将这份精神遗产在其家庭生活中发扬光大,引导子女超越物质层面的追求,将注意力转向精神的丰盈与对社会的贡献。

韬奋先生亦善于从“小事小节”中打磨子女的品性。自从有了孩子后,韬奋先生“总要逗着孩子玩一阵子才走进他家中的工作室”“无论工作多忙,他总要抽点时间和孩子玩。”^③他重身教,通过守时、践诺这

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建设研究”(24&WZD11)、韬奋基金会2025年度规划课题“文化主体性视域下韬奋精神的历史定位、典范意义与时代价值”(TF2025135)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版,第1页。

② 参见马永春:《新闻记者的旗帜邹韬奋》,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版,第4页。

③ 参见聂震宁:《心向光明:邹韬奋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25版,第81页。

些看似琐碎的日常规范,身体力行帮子女培养好思想、好品行、好习惯,于无声处涵养的,是足以支撑子女一生的精神力量。

“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①韬奋先生的教育实践,正是这一思想的生动先声。子女在耳濡目染中,潜移默化地继承了父亲的优良品质,从做好小事、管好小节开始起步,踏踏实实修好品德,最后都成长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

三、把相亲相爱化为家风纽带

邹韬奋与夫人沈粹缜的婚姻,本身就是“相亲相爱”家风的生动体现。沈粹缜“以一位东方女子的善良和贤惠支撑起家里的全部重担”,对邹韬奋的照顾无微不至,“连车钱和买东西的钱都要事先分别包好放在他的口袋里。”^②而邹韬奋对妻子同样充满深情,他在家书中常流露出对妻子的牵挂与体贴。这种相濡以沫的夫妻关系,为子女树立了平等互爱的榜样。沈粹缜曾深情地回忆:“我对我的婚姻是满意的,因为韬奋是一个有知识的正派人,身上也没有我所厌恶的那种铜臭;经济生活虽然算不上富足,但也不拮据;他信赖我,把经济权和家事全部托付给我。我感到美满和幸福,我觉得做好我丈夫的贤内助,操持好家事,抚养好孩子,使他在家庭中生活得更加舒适,能够把全部精力放在工作上而无后顾之忧,是我的天职。我的家庭是温馨的,外面的风暴吹不到窗户里面来。而韬奋对这样的家庭生活,显然也是感到愉快和满意的。”^③这种基于尊重和理解前提下形成的和谐家庭氛围,成为培育下一代健全人格的温床。

在亲子关系上,邹韬奋打破了传统父亲的威严形象,以平等民主的方式与子女相处。“有一次,小女儿不晓得受了什么委屈,独自趴在地上哭闹,任谁劝也劝不住,韬奋只好也伏在地板上陪着小女儿一起‘哭’。爸爸假哭的声音可能十分可笑,惹得小女儿哭着哭着竟然破涕为笑。”^④这种充满智慧的陪伴,既化解了孩子的负面情绪,又增进了父女感情。在教育方式上,他主张民主开放,在与妻子对待孩子零用钱问题的分歧上,他更倾向于通过给予零用钱让孩子学会支配金钱,“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习惯和能力。”^⑤

邹韬奋深谙“家和万事兴”的古训,着力构建平等民主、相互尊重的家庭关系,这为优良家风的生长提供了情感沃土。“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⑥在这片温暖的归宿里,高尚的价值追求得以自然浸润、抽枝散叶。

邹韬奋以家国情怀为魂、品德塑造为基、相亲相爱为纽带所构建的家庭教育体系,不仅成就了一个模范家庭,更为破解当代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困局提供了崭新视角。

第一,连接“小家”与“大家”的育人路径。邹韬奋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本质上是一种将个人修养、家庭伦理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 的教育实践。他将家庭作为价值传递与精神传承的重要场域,带领家庭成员既爱小家也爱国家,共同升华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是“修齐治平”从个人到家国的现实演绎。这种教育方式打破了“公私领域”的界限,为当代家庭提供了重要启示:今天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其目标不能止步于培育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更要着眼于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家长要帮助子女在真实的社会体验中树立正确的家庭观、民族观、国家观,把爱国与爱家统一起来,把个人理想、家庭教育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紧紧联系在一起,汇聚起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第二,坚持“生活即教育”的育人方式。邹韬奋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核心在于将道德教化和品德培

①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版,第18页。

② 参见马永春:《新闻记者的旗帜邹韬奋》,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版,第59页。

③ 参见邹嘉骊:《忆韬奋》,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版,第382页。

④ 参见聂震宁:《心向光明:邹韬奋传》,江西人民出版社2025版,第82页。

⑤ 参见马永春:《新闻记者的旗帜邹韬奋》,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版,第58页。

⑥ 参见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版,第283页。

养融入生活细节。当下不少家庭或陷于“重知轻德”的功利取向,或困于“道理空悬、小事不管”的虚浮状态,缺失的正是这种落细落小落实的生活化路径。“生活即教育”的理念深刻启示我们:品德养成需要抓住关键时期,结合年龄特点,并在真实生活场景中一点一滴积累。比起物质与技能的堆砌,品德教育能够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是家庭给予孩子最宝贵的财富。

第三,把握“关爱而不控制”的育人智慧。邹韬奋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精髓在于平衡“关爱”与“放手”。他既给予子女温暖陪伴,更尊重其独立探索的天性,在兴趣培养中支持子女自主选择、宽容试错。在孩子能力的“最近发展区”内赋予自主权,是培养独立性、抗挫力和心理弹性的关键。当下,许多家庭在“过度包办”与“疏于引导”间摇摆,正是因为缺少这种有温度、有分寸的教养定力。邹韬奋的实践深刻启示我们:真正的家庭教育,不是为孩子扫平前路,而是陪他学会在风雨中行走;不是将他护于羽翼之下,而是助他生出自己的翅膀。

“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无论经济社会如何发展,对一个社会来说,家庭的生活依托都不可替代,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家庭的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①我们要从韬奋先生的家庭家教家风智慧中汲取力量,不断开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新局面,让家庭真正成为人民的幸福所在、社会的和谐之源、国家的富强之基。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Contemporary Promotion of the Taofen Spirit (by Writing)

NIE Zhenning, XIAO Weiguang, JIAO Ziying, LI Linqing, CONG Ying

Editor's Note: On November 5, 2025, at the symposium commemorating the 13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Mr. Zou Taofen, it was emphasized that Mr. Zou Taofen was an outstanding cultural warrior, a great patriot, a distinguished publisher, and a prominent journalist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 He embodied the noble demeanor of China's advanced intellectuals and represented the cultural image of Chinese Communists. Mr. Zou Taofen is “the glory of our Party”, and his unwavering patriotism in dedicating himself to national affairs and serving the country with his pen, his steadfast commitment to progress and his pursuit of enlightenment, his selfless devotion to serving the public, as well as his creative talents in promoting culture and forging ahead with innovation, all constitute invaluable spiritual assets for the new era. We must deeply explore the rich veins of the Taofen Spirit and, through studying, researching,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it, contribute to the comprehensive advancement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building China into a great power. To commemorate the 13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Mr. Zou Taofen, based on the written exchange on the previous issue, we have invited the following experts to contribute to this column: Nie Zhenning, the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Reading Promotion Committee of the Publishers Association of China and former Chairman of the Taofen Foundation; Xiao Weiguang,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the guiding teacher of the Youth Lecture Team for the Taofen Spirit, and a former senior editor at the Theory Department of the People's Daily; Jiao Ziying, a young teacher at Shanghai Art & Design Academy; Li Linqing, a young teacher a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and Cong Ying, a researcher from the 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Beijing Municipal Commission for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They will engage in discussions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including the Taofen Spirit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publishers in the new era, the four dimensions of the Taofen Spirit, the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the Taofen Spirit i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he family values, education, and tradi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Taofen Spirit as well as their contemporary significance. Our aim is to activate this precious spiritual resource, and guide publishers in the new era to remain true to their original aspirations, to forge ahead, to innovate and to shoulder their historical mission, thereby continuously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an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the Taofen Spirit; publishers; responsibility in the new ear; view on physical education; family values, family education and family tradition

(责任编辑:傅游)

^① 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版,第353页。